

金庸小说的 情爱世界

陈 墨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金庸小说的 情爱世界

陈 墨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陈墨 著

责任编辑:岑杰 责任校对:张桂芳 装帧设计:贾愚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巢湖地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1.25

插 页:2

字 数:234,000

版 次: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21-8/I·740

定 价:6.4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金庸，一代武侠小说的大宗师，迷倒无数读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言情圣手。女作家三毛曾独具慧眼地对金庸说：“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金庸小说不仅是刀光剑影、扑朔迷离的武侠世界，而且也是丰富深邃、感人至至的情爱世界。

本书作者陈墨被誉为“大陆第一位金学家”，其《金庸小说赏析》出版后，受到读者和金庸本人的赞赏，他的五部金学研究系列也被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计划”。本书系作者应我社之约的近期力作，他独辟蹊径地切入了“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以活泼流畅的语言，生动地描述并分析了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揭示了爱情与民族文化、与社会现实、与伦理道德的冲突，揭示了爱与性、爱与婚姻、爱与宿命、爱与个性、爱与事业、爱与

死、爱与仇怨等诸多复杂的人生纠葛，是一部集普及与提高的通俗学术著作。

一览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更令广大金迷们感慨万千。

引言

都知道金庸是一位武侠小说的大宗师，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位真正的言情圣手。他的小说不仅是刀光剑影的武侠世界，而且也是丰富而深邃的情爱世界。

有一个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这人是我们大家都熟悉并且热爱的女作家三毛——愿苍天保佑她芳魂安息并与她的心上人永不再分离——她也是一位金庸迷。她在同另一位金庸迷、台湾著名科学家沈君山先生聊天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我以为作家有两种：一种完全凭想象的，譬如写武侠小说的金庸先生，我非常佩服他。我通常没有多余的时间看武侠小说，但金庸的作品每一部都看。在创作上，我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他写的东西都是无中生有，却又非常真实动人，形式上是武侠小说。”

“我曾对金庸先生说，你岂只是写武侠小说呢？你写的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

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

“我跟金庸先生的作品虽然不同，就这一点来说，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写一‘情’字……”^①

三毛是一位有个性的作家，她看金庸的小说也独具慧眼，上面这段话是很精辟的。

想一想也应该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更不应该大惊小怪。《红楼梦》的作者称他的书是“大旨谈情”，也就是“言情小说”了，但我们尊敬的鲁迅先生却说《红楼梦》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秘事……”（《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创作”与“接受”不完全是一回事，优秀的作品总是“形象大于思想”。而杰出的作家，总是要克服这类的困难与局限。

《红楼梦》是这样，金庸的小说也是这样。

在金庸的小说中，不仅可以见仁、见智、见侠、见义、见文、见武；有“排满”也有“反元”；有“宫帏秘事”也有“江湖野史”……还有许许多多缠绵悱恻动人无比的爱情故事。三毛是凭着她的女性的直觉、作家的敏感以及有情人、多情人的“本能”而发现这一点的。

“情”之一字颠倒了多少众生，创造了多少美妙的悲歌和幸福的吟唱，刺激了多少幻想和迷梦、快乐和呻吟！

这里，“情”或“爱”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情爱

① 三毛：《梦里花落知多少》第18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8月版。

包括了爱侣、父子、母女、夫妻、民族……等各方面的情感形式。而狭义的情爱即我们的一般意义上的情爱，是专指男女之间的爱情，“就是像一道看不见的强劲电弧一样在男女之间产生的那种精神和肉体的强烈倾慕之情。”①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无论就其广义而言还是就其狭义而言，都是精妙绝伦的，不过，为了主题明确，在这本书中，我们所要赏析和讨论的，将只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武侠小说兼而言情，倒并非金庸的独创。至少自清代就产生了“儿女英雄”一大类型，《儿女英雄传》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了近代（民初）又出现了李定夷等人的“哀情小说”。到30年代，由“鸳鸯蝴蝶派”起家、著有《琼楼春情》、《落絮飘香》、《朝露相思》等社会言情小说多部的王度庐，改弦易辙，专门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独创“悲剧侠情”体，成为武侠小说作家中的巨擘之一，人称“情侠”，对后代的武侠小说创作影响极大。

50年代初兴起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涉及了男女之情事。甚而有不少的小说，挂的是武侠小说的招牌，写的却是男女的情感和欲望。

先于金庸而创作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先生，一部《白发魔女传》以其震撼人心的爱情悲剧而名世；后于金庸的古龙，一部《多情剑客无情剑》以其“情到浓时情转薄”的独特境界而广为流传。

① 瓦西里耶夫：《情爱论》第1页，三联书店1984年10月版。

那么，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究竟有些什么非同一般之处呢？

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它的严肃性。

我们之所以要用严肃性这一看来有些“煞爱情风景”的字眼来概括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的第一特征，那是因为在武侠小说世界中，“下三滥”太多了。不少的小说挂羊头卖狗肉，挂着武侠小说的招牌写色情，而挂着情的牌子来卖“人肉”，致使他们笔下的所谓武侠小说，真的成了“暴力与色情”的藏污纳垢之处。社会上有许多人看不起武侠小说、乃至厌弃憎恨武侠小说，平心而论，是无风不起浪的。在一些小说中，没有侠甚至也没有武，没有个性甚至也没有爱情，没有思想主题甚至也没有情节，有的只是男女、欲望、动作的“细节”而已。幸而，这一类作品并不占多数，流传到大陆读书界的则更不多。

多的是另一种情形，即把爱情作为一种调味品，作为一种“佐料”或“配菜”，写入小说中，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敷衍情节，如此而已。如果说将武侠当成色情来写是思想上的不严肃乃至人格低下，那么将爱情当“佐料”的作家至少应该说是在艺术上十分不严肃的。我们知道，在武侠小说家中，不严肃的恐怕要比严肃的多。其笔下陈旧老套的爱情广告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幸而武侠小说中还有严肃的作家作品，诸如我们熟悉的金庸、梁羽生以及中晚期的古龙与萧逸等人的作品。因为他们对武侠小说的创作态度相对严肃而又严谨些，其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也就随之而严肃或严谨了。不过，其间也

还有差异，有创造者也有敷衍者；有探索者也有专卖狗不理包子的人。金庸属于创造者与探索者，正因为他的严肃的创作态度，才使他成为武侠小说大师及武林的盟主。

其次，是它的丰富性。

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姿、五彩缤纷的世界。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故事，绝大多数都是互不相同的。

这一点，金庸就明显超出了梁羽生和古龙。其他等而下之的作家就更不必多说了。——梁羽生固然写出了《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等杰出的爱情故事，但他的大部分作品，过于拘泥于“正格”，美与善的要求限制了真与深及其多样化的发展。结果大多弄成了英雄儿女喜结良缘的一种模式。同样，古龙虽然写出《多情剑客无情剑》这样优秀的小说，但他的大部分爱情故事，都与此相似，这使其总体的成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再则古龙笔下人物的爱情观念多少有些过于现代化，往往直接将作者自己的爱情——性欲观念及方法形态直接套到书中的古人身上，而且套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主人公身上，他笔下的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叶开、沈浪……等“名人”的爱情观念及态度大同小异。尽管作者在每一部书中都要议论不休，但在这一话题上少有新义，且整个而言，似乎有重欲的描写甚于对情的描写的倾向。

金庸的小说几乎从不议论爱情——它只是叙述和描写一个又一个各自不同的爱情故事，不仅同一部书中的爱情故事各自不同，而且不同的书中的爱情故事，也少有雷同者。

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显示了他的非凡的言情功夫。小说的主线便是陈家洛与霍青桐、喀丝丽之间的爱情悲剧，显示出爱情与个性、宿命、社会、事业、心理……等多方面的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复杂的悲剧冲突。（对此我们在后文中将要详细讨论，下面提到的爱情故事也是如此）而只要我们注意，我们还会发现，这部小说的爱情悲剧的角色远非陈家洛一人，还有他的母亲徐潮生与他的义父于万亭、他的师父袁士霄、他的属下无尘道长、他的属下余鱼同等人。这些人的爱情悲剧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悲情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爱情悲剧的成因及其表现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徐潮生的爱情悲剧是婚姻不能自主、爱情不能自由的悲剧，这是一个古老的命运的悲剧；而袁士霄的爱情悲剧则纯属性格悲剧；无尘道长的痴情被残酷地欺骗了，以至愤而出家；而余鱼同则因为爱上了本不该爱的结义兄长的夫人而痛不欲生……。

在同一部书中，作者也给我们展示了美好的爱情的“正格”——只是这种美好的一面常在悲剧人物及其悲剧情愫的包围之中——如阿凡提和他的夫人的爱情充满了生动幽默的情趣；文泰来与骆冰这对夫妻可谓刚柔相济、优美和睦；徐天宏与周绮则颠倒个性的常格，女的豪爽，男的多智，不打不相识；而“天山双鹰”陈正德与关明梅则是悲喜交加，一生吵吵闹闹别别扭扭，情不自禁地成为一对“冤家”……由此，我们是可以看出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的多姿多彩。其他小说也像《书剑恩仇录》一样，展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不同风貌的丰富复杂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在其他作家作品中是无法看到的。

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的丰富性不仅在于其爱情内容的多彩多姿，而且也在于它的叙事与描写的方法、技巧、形式的变幻莫测。有详、有略；有深有浅；有悲有喜，有正面铺排，有侧面点染；有烘云托月，也有暗示和象征。以各自不同的方法形式，展示了不同的爱情风貌。使之成为极富艺术价值的审美对象。——“人们自古以来就在探索爱情的秘密，试图认识它的本质，因为爱情既给人们带来明朗的欢乐，又给他们造成深沉的痛苦。各个时代关于爱情都有形形色色的议论和箴言，既有诗意的赞颂又有痛切的抱怨；有虔诚，也有庸俗；有兴高采烈，也有沮丧颓唐；有青年时代的鲁莽，也有对命运的诅咒。……”^①

其三，是它的深刻性。

一般小说中的爱情故事能写出它的美好，却难写出它的深刻。而金庸却以他的生花的妙笔写出了一个又一个精妙纷呈的爱情故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及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爱情的复杂而矛盾的本质。

金庸对爱情本质的深刻揭示，首先来自于他的严谨的创作态度，在他的小说中，固然不能否定有时也有敷衍故事的现象，从而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浅俗和雷同，但在总体上，金庸并没有将爱情当成佐料或广告来写，而是认真地按照环境与个性复杂而独特的矛盾关系、按照不同人物的不同气质和心理来叙述不同的爱情故事。

以此为基础，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更进一步地建立了它的独特的艺术真实形态。无可置疑，金庸的小说属于虚

① 《情爱论》第1页。这些，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几乎都能读到。

构的浪漫的传奇，其中的爱情故事亦属于骑士的浪漫史。但金庸的爱情世界并非建立在浪漫的虚构上。一方面，金庸广泛涉及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真实的爱情生活及爱情文化心理的内容——这在一般的武侠传奇小说中是难以想象的——诸如前面提到的《书剑恩仇录》一书中的陈家洛的母亲徐潮生，当年青梅竹马的恋人是于万亭，而她的婚姻却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决定，嫁非其人。再如《飞狐外传》中的袁紫衣的母亲袁银姑被恶霸凤天南强奸和霸占、又被伪善的汤沛欺凌与侮辱的惨痛经历，这些都无疑具有明显的生活真实的特征。小说中的爱与性、爱与婚姻以及爱与伦理、爱与道德等等观念及其形式，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独特的爱情文化的风貌与本质。

当然，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的主要内容，显然是属于虚构与传奇形式的。小说中存在的大量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等等现象，都是中国古人所难以完全做到的，而在金庸的小说中（在梁羽生、古龙等人的小说中也一样）“男女平等”似乎早已实现了。不过，就爱情的描述而言，这种“男女平等”的虚构，乃是讨论或探索爱情真义和本质的必要的前提。否则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直入爱情世界。——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在人类文学史上的爱情悲剧的故事常有两种基本的模式：一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或“梁山泊与祝英台”模式，即爱情与命运的冲突模式，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那是因为总有一股外在于爱者的力量阻挠着，与这种强大的外在社会力量相比，情人们的弱小无助，格外地使人怜悯和悲伤。如我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故事《梁山泊与祝英台》、《孟姜女》、《牛郎织女》、《白蛇

传》等等基本上都属于这一模式。梁山泊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是由于父母的反对而造成的；《孟姜女》中秦始皇修长城是一对和美夫妻天各一方；牛郎织女的相隔相望的悲剧是由王母娘娘造成的；而白蛇与许仙的美好恋情则是由多事的法海和尚竭力破坏的，可见无论人间天上、神仙（王母）皇帝（秦始皇），都不允真正美好的爱情自由的发展与结合，父母之命以及多事的法海和尚成为否定爱情的决定性符号因素就更容易理解了。另一种爱情模式则是“梦幻式”——也许这种梦幻的“神仙眷属”理想正是建立在悲剧的现实基础之上——梁山泊与祝英台不能在人间结合，便双双“化蝶”，《牡丹亭》中的男女主人公也经历了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的非人间的浪漫历程；《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婚事，也需要张生点了状元作为“条件”（这事实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梦幻，有几个书生能如愿地做状元呢？况且这一交换条件本身已经变成了爱情的反动），可见“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只不过是一种永恒的梦幻或理想。曹雪芹要将记述他的生活经历的故事命名为《红楼梦》恐怕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

总之，无论哪一种模式，其对爱情自身以及具体的恋爱主人公自身的描述都是简单、抽象、符号化的。这些爱情故事，无论是悲剧或喜剧，都要到爱情之外去寻找否定或肯定的支撑点，外在势力的强大掩盖了爱情与爱人本身的种种有缺陷的真相。

金庸的爱情世界，则通过男女平等的虚构，直接进入纯粹的爱情的核心领域，直接而真实地刻划爱情主人公们的种种真实的形态与神态。这正是它的深刻之处，它是——

正为维克多·雨果所言——“借暂时的人物来描写永恒的人性”（《九三年·序》）。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是真正的情人的世界，进而，是真正的人的世界。在这里，作者给我们揭示了，人成为真正独立而自由的人（男女都一样）以后的爱情故事及情爱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情爱的本质。过去爱情故事总是建立起一个虚幻的梦想，以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便会“万事大吉”，金庸的小说彻底地打破了这一迷梦。从而使我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更深的真实层次。

概而言之，金庸的小说叙述的不仅仅是一些美好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是——在这些爱情故事组成的情爱世界中——揭示了爱情与民族文化、与社会现实、与伦理道德的多方面的冲突的同时，也还进一步揭示了爱与性、爱与婚姻、爱与宿命、爱与个性、爱与事业、爱与死、爱与仇怨以及爱与人生（在各方面）的种种复杂的纠葛，最后，它揭示了爱情心理以及爱与人性的自身的深刻的、多方面的矛盾本性。

就其丰富性而言，金庸小说的爱情世界差不多建立了一个包括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爱情故事的博物馆，其间的爱情主人公的个性与心理可谓千差万别，令人眼花缭乱。而就其深刻性而言，金庸笔下的情爱世界像是一部爱情文化的百科全书，像是以小说形式——而且是武侠小说形式——写成的真正的“情爱哲学”或“爱的艺术”的专著。不同之处，在于金庸小说是一个现象世界，“述而不作”，因而更生动、更形象、更具体。

其四，是它的独创性。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是个充满独创性及其富有探索精神的世界。在这里，很少有什么“模式”可言——不少的作家都是靠“模式化”为生的，甚至像梁羽生与古龙这样的作家都未能幸免。可以说模式化乃是“通俗文学”（不管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还是其它什么类型的流行文学）的根本特征。——在金庸的笔下，每出现一个新的角色，每讲述一个新的爱情故事，就会有一番新的风景、新的气象。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部新的作品都是一个新的独立的世界。

金庸的小说创作不仅仅是在写作，更不是在——按照某种固定的观念或情节公式——编织，而是在探索中创造，或在创造中探索。

最明显的证据，是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找不出一个适用于一切的“爱情本质论”之类的基本观念。金庸全部十五部长短篇小说中都有爱情故事，而且绝大部分作品中都有数种乃至十数种爱情故事，这些爱情故事牵涉到十数人乃至数十人（在其全部作品中讲述了近百个爱情故事，牵涉到数百位爱情主人公），但却绝对难以找出它们的“通行证”，找不出它们的模式或适用于一切的规律与观念法则。这表明作者在讲述一个新的角色及其爱情故事时，都有一番新的揣摩、新的探索和新的创作构想。而且每一种新的探索和新的构想总是要伴随着新的角度、新的侧面或新的观照方式与表现方式。

金庸之所以能极大地发挥他的独创性，创造一个巨大而又丰富独特的爱情世界，写出种种不同的爱情故事及千姿百态的爱情形态，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作者真正把握

了其笔下的人物的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的人生际遇及其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的理想追求。——有多少不同的个性存在，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爱情故事。因为爱情本不是一种抽象之物，而是具体的发生于特定的男女对象之间的人际及其心际与心理内部的特定关系与特殊心理状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因而，不同的人物之间的爱情关系及其心理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爱上同一个人，或同一个人爱上不同的对象，其心理状态及其表现形式都是大不一样的。——这正是爱情成为“永恒的主题”而且常写常新的根本原因。同人生世界的其他领域一样，爱情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爱情故事的天地中并不缺少新意与新的趣味，而缺少真正的探索与创新精神。

艺术贵在创新（可是这一句话已成了人们共知的老话）。大师与庸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既不重复他人，又不重复自己。这一特征也完全适用于言情作品的创作领域。不少的专业言情的作家作品之所以永远在书摊与书亭之间徘徊，那是因为他们要么是在重复着他人讲述的故事，要么在不断重复着自己先前的经验公式，要么——更糟的是——既重复他人又重复自己。

金庸并非专业的言情作家，而是在武侠小说中“兼职”言情，却创造出了如此独特而丰富的、充满新意与生气的情爱世界，这才更加难能可贵，更加显示出他的非同一般的人生阅历、艺术功力和他的大宗师的风度、修养和才华。

三毛是对的。她发现并指出了金庸的小说“包含了人